

徐中舒文存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李 懿 选编

徐中舒

惟此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歷千萬祀

與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
国学
书系



江苏人民出版社



徐中舒文存

XUZHONGSHU WENCUN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李 懿 选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中舒文存/徐中舒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11

(清华国学书系)

ISBN 978-7-214-16795-8

I. ①徐… II. ①徐…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②汉字—古文字学—文集 IV. ①K207-53②H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5990 号

书 名 徐中舒文存

选 编 李 懿

责任编辑 孙 立

装帧设计 姜 嵩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mcb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8.75 插页 2

字 数 38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6795-8

定 价 5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桢、吴其昌、高亨、刘盼遂、徐中

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 and 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有助于

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2年3月16日

本文存共收录集中反映作者治学特色的文章二十四篇，文章后附作者大事年表与撰述系年目录。

为了保存作者的文字风格、语言习惯，对于原文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编者未作改动，作者引书时有省略改动，倘不失原意，编者亦一仍其旧以存著述原貌，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及外文拼写错误，则予以改正。

文中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点。

导论：徐中舒的生平与学术

—

徐中舒先生(1898—1991),初名裕朝,后改名道威,字中舒,清光绪戊戌二十四年农历九月初一(1898年10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他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古文献学家,尤其在先秦史和古文字领域取得卓越的成绩。其家世与生平经历在《先母事略》^①、《我的简历》^②和徐亮工先生所撰《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③中有详实的记载。

徐家世代聚族居于怀宁城西北三里左右盛唐山下之月形山,世又称徐家坂。先祖振庆公长子家文即中舒父亲。家文公出身贫农,然而聪慧异常,言谈尔雅,因家境清寒弃农而改习木工,其雕镂之精常得乡人赞誉。五口通商后,吸食鸦片之风日侵社会,家文公以出入城市之故,不幸染上鸦片,不出一二年称贷经商所营之业因吸鸦片而败落。光绪庚子二十

① 徐中舒:《先母事略》,1945年12月21日自印稿,载于同年《安徽文献》第2卷第4期。

② 参见1968年7月10日徐中舒所撰《我的简历》。

③ 徐亮工:《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未定稿),《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

六年(1900)正月家文公在大通替人建房时不慎从房上摔落而逝世,尚不满两岁的徐中舒从此失怙。其时振庆公已于去年(1899)腊月去世,两位叔叔析产异居,自给不暇,家中已无儋石之储,其母金氏“椎心泣血,以死自矢”。1902年徐中舒随母栖身于安庆清节堂一间只有十多平方米的矮小房屋内,清节堂是收养贫困守节寡妇且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慈善机构。母亲不辞辛劳,入清节堂新设织布厂做工,稍得工资以供日用。《先母事略》中记录了母亲夙兴夜寐勤劳织作的情景:

织布厂之创设也,正及吾入学之年。……吾母在织厂所得工资,恒较针黹缝纫为优,吾母织作于此,亦与相终始。前后凡七年,每旦辨色而兴,则促不肖起,不肖东行入学,则吾母西行入织,及薄暮,不肖归自学,则吾母归自织。入夜则一灯荧然,凡日间未竟之事,如不肖母子衣服缝治与浣濯,皆于此时为之。往往刀剪声与砧杵声相杂下。或至凌晨,鸡鸣入息片时即兴。吾母织作之勤,恒倍他人。每当盛暑,汗出如沅,机旁恒置水一盆,巾一方,汗下则出巾自拭。闲时绞之,则若小雨淅沥自檐溜间下注于盆。及今思之,其艰辛之状,不禁为泪涔涔下也。……凡吾今日之得粗有成就,除先辈恩我之外,又何一非吾母之赐。^①

母亲身处逆境仍坚韧不拔、自力更生的意志深深地感染着徐中舒,并成为以后他在人生与学业道路上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光绪丙午三十二年(1906)徐中舒入清节堂附设之育正高初两等小学堂接受启蒙教育。宣统辛亥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育正小学停办,转入安庆市尚志小学六年级,1912年考入安庆皖省中学,因无力支付学费而中途辍学。1914年,徐中舒以优异的成绩直接跳级就读于安庆初级师范学校(安庆第一师范学校),师从胡远浚,这时所受的三年中等教育为其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自云:“一九一七

^① 徐中舒:《先母事略》,《安徽文献》,1945年第2卷第4期,第7页。

年我在初级师范毕业，这时我所受的中等教育，是我一生最重要的阶段。我在这里啃了些中国旧书，在这里我受桐城派的影响很深。学校里学古文只是练习写作的，但我受了桐城派的启示，就不能以此为满足。桐城派要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我就要求从这三方面充实我自己。”^①胡远浚是桐城派吴汝伦的弟子，长于老庄之学，著有《庄子诠诂》、《老子通义》行世，晚年任教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徐中舒时常向胡远浚请教庄学问题，深受桐城派的熏陶。胡远浚的国文课是徐中舒最喜爱的课程，在胡的指导下，徐中舒治古文及先秦诸子书甚勤，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热情很高。牢固的古文基础使徐中舒能够顺利阅读古文献、接触大量原始材料，对古代社会的了解也就愈加深入。因学桐城派古文之故，他在上海做家教时又接触了西方思想，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社会通论》、《群学肄言》等以增长见识。

1917年1月，徐中舒从安庆第一师范学校毕业。9月，再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数理系就学。1918年1月，再次因无法支付学杂费和满怀对中国古代学术的热爱而中断学习，在安徽省庐江县裴家岗小学短暂任教，其后公费考入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然终因不忍舍弃传统文化而辍学。1920年初至1924年，经胡远浚介绍到桐城方守敦家任家庭教师一年，又经董嘉会介绍在上海李国松家任家庭教师，均以讲授《左传》为主。1925年2月，在上海黄家阙路私立立达中学任教。

1925年7月6—7日，徐中舒参加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招生考试，以第四名的成绩被录取，这是其治学路上的重大转折点。徐中舒入学登记之研究科目为“古文字学”，入学后深受王国维、梁启超和李济^②思想的熏陶。1925年王国维普通演讲的题目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所指导的研究题目包含经学、小学、上古史、中国文学等8个之多。王国维以古史考辨和古文字学见长，徐中舒亲炙王门，以先秦史和古文字学

① 徐中舒：《我的思想检查》，《人民川大》第4版，1952年7月14日。

② 参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16页。

为主攻方向。报考国学院之前徐中舒便对王国维的博学多识钦佩不已。《追忆王静安先生》云：“民国十年，余在上海得瑞安孙仲容先生所著书，其《名原》一篇，雕刻窳劣，所引古文字，率以墨钉替之，每一执卷，辄难卒读，因广搜彝器款识龟甲兽骨文字以补其阙，遂于上虞罗氏所刻《雪堂》《云窗》两丛书及英人哈同所刻《广仓学窘丛书》中得读先生所著书不下数十种，于是始知并世学者中乃有谨严精深之大师如先生其人者。”^①

1925年，徐中舒听闻王国维将担任主讲席于国学院，决然前往就学。当时王国维已声名显赫，《观堂集林》是人人爱不释手的必读之著。王国维讲学每周二至三次，从不迟到早退，授课时先讲《说文》，从后序讲起，再详讲部首，又讲《书经》（古史新证），旁及钟鼎甲骨，多有敷陈，陈辞滥套皆略，再讲《仪礼》和钟鼎文、铭文拓本等。^② 王国维的课程囊括了经学、古史、古文字学的内容，课下设立研究室，与学生论学解惑，这对求知若渴的徐中舒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追忆王静安先生》云：“研究院于公共课之外，每位教授各设一研究室，凡各教授所指导范围之内之重要书籍皆置其中，俾同辈得随时入室参考，且可随时与教授接谈问难。（王国维）先生研究室中所置皆经学、小学及考古学书籍。此类书籍，其值甚昂，多余在沪时所不能见者。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爇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③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之一，王氏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证纸上材料之缺失与错讹。^④ “二重证据法”显现出考古学、考古学的实证性和跨学科的借鉴性。在金石学盛行的宋代便已开启以考古

① 徐中舒：《追忆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上海），1927年8月7日第五卷一、二合期。

② 周传儒：《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2辑，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第216页。

③ 徐中舒：《追忆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上海），1927年8月7日第五卷一、二合期。

④ 王国维：《古史新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

之物补证纸质文献典籍和验证古史文化之风，但将之概括成理论则始自王国维，徐中舒在学术生涯中提倡广泛的史料观以拓宽研究即得益于“二重证据法”的启示。

1926年，徐中舒顺利完成课业和毕业论文，毕业成绩分甲等9人，乙等15人，丙等5人，徐中舒名列甲八。其毕业论文《殷周民族考》和《徐奄、淮夷、群舒考》，分别由王国维和梁启超指导。徐中舒深受李济近代考古学和人类学新知识的感染，《殷周民族考》对人种学的观念、思想有所探索和化用。^①徐中舒在国学院学习到基本的研究方法和途径，继承了乾嘉以来三百年的传统，并接受经史子集以外的新方法和新学说等，奠定了术业的专攻方向。陈寅恪夸奖徐中舒是“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好的学生”。^②

1926年9月，徐中舒受聘于合肥市安徽第六师范学校（后改为合肥第二中学），其后在上海立达学园、国立暨南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29年2月，他辞去教职，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任编辑员。徐中舒赴职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整理和编辑出版明清内阁大库档案。1929年8、9两月徐中舒率同史语所尹焕章将档案运至历史博物馆午门楼，由傅斯年和徐中舒设计，招雇书记、工人约二十余人进行整理。史语所第一组组织“明清内阁档案编刊会”，推选傅斯年、陈寅恪和徐中舒为委员，负责审定编印史料事务。1931年《明清史料》甲编出版，共计10册1000页。同年12月，徐中舒担任史语所秘书。1933年3月日军强占承德，平、津震动，刊布工作停止。1934年徐中舒在北平继续从事档案的整理刊行。1935年1月，史语所第一组在北平成立“明清史料复刊会”，由傅斯年、陈寅恪和徐中舒担任委员。

1929—1938年春是徐中舒初露锋芒的时期，他在史语所攀上了学术

① 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1—32页。

② 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5页。

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思想上潜移默化受史语所治学风气的感染,使用新材料和新方法探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成为其毕生追求。其时史语所具备全国最优越的科研优势,经费充足,资料极富,人才济济,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等专家均任职于此,“集众”的研究环境使徐中舒如鱼得水,与诸人同声相应,互相引会。

徐中舒任职的9年是史语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从无到有竭力树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初建时期,所长傅斯年列出三条检验历史学、语言学进步的标准,主张用近代自然科学的全部研究来代替书院学究的研究模式,其治学观可以概述为“扩张研究的材料和工具”。^①傅斯年多次组织受过现代考古训练的专家有组织有步骤地奔赴安阳殷墟进行发掘工作。1935年5月,史语所主持的殷墟第11次发掘(侯家庄西北冈工地)开始,这是史语所历次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考古工作在国际上最显赫的时期,总计从1928年到1937年间共完成发掘15次,获得各类文物等考古资料,堪称近代考古学上的伟大成就。徐中舒虽未供职于考古组,却经常参加考古组的活动。^②王国维当时能够见到的地下材料多半是古文字,徐中舒因工作之便仍有机会参观考古挖掘之物。《再论小屯与仰韶》中说:“民国十八年十一月李济之先生从安阳来平,携着他的殷虚第三次发掘所得的重要物品。……当李先生开始清检这重要的发见,我得最先的一件一件的见着。”^③

这一阶段徐中舒共有十八篇文章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另有四篇刊载于史语所的出版物,具有代表性的是《耒耜考》、《邇敦考释》、《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鼂氏编钟图录附考释》、《陈侯四器考释》、《古代狩猎图象考》、《弋射与弩之渊源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刘梦溪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7页。

② 据胡厚宣:《追怀史语所前辈师友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的先进经验》回忆,当年考古组的合影,徐中舒一般都参与其中。

③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第145页。

释》、《说尊彝》等等，这些文章表明积极扩充研究材料已成为徐中舒治学的自觉，总体上折射出“一份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①的观念，徐中舒“史之良窳率以史料为准，史家不能无史料而为史，犹之巧妇不能无米而为炊”^②的思路和傅斯年“近代的历史学只能是史料学”的观点不谋而合。徐中舒将近代学术进步直接归因于从书里到书外努力搜寻新材料的结果：“近代学术的进展，如其说是方法的革新；毋宁说是材料的扩充。用实验方法去寻求真理，固属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材料，又何从去实验呢？……近代学术的进展，是人们离开书本子而向宇宙间去搜寻去扩充材料的结果。自然科学是如此，人文科学也不能例外。”^③徐中舒治学注重各学科知识的相互借鉴，具体表现为“古文字研究与史料的扩充”、“考古学资料与古史研究”、“古器物学中的古代历史”、“史料年代之断定”和“民族学史料与古史的互相补正”。^④

1938年春，史语所从长沙迁至昆明，徐中舒接受四川大学聘请，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此一直执教于此，兼任教于嘉定武汉大学历史系、华西大学历史系、燕京大学历史系和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徐中舒十分关心西南地区的文物考古事业。1951年徐中舒与冯汉骥、邓少琴在重庆筹备西南区文物展览，收购成渝两地流散文物，充实库存藏品，并选聘热爱文博事业的中青年干部。在徐中舒的关怀下，博物院的初步筹建和出土文物的清理、发掘、保护、宣传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同年秋，徐中舒陪同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长裴文中及西南文教部副部长李长路到北碚和歌乐山考古调查。

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继起。1958年7月，徐中舒被迫在川大教育改革大辩论会上作检查，深受非难。其次子、三子相继被错划为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第347页。

② 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第652页。

③ 徐中舒：《近代学术是怎样进展的》，《生活与学习》（月刊），1946年第1卷第5、6合期，第4—5页。

④ 徐亮工：《从“书”里到“书”外：徐中舒先生的学术与生平》（代前言），《川大史学·徐中舒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31页。

右派分子,直到1979年初错划右派案才得以平反。1966年“文革”开始,徐中舒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非人折磨,其间被关押在川大“牛棚”进行“集中审查交待”,不准回家与家人见面。从“牛棚”放回家后,每天都要参加批判学习及劳动改造,徐中舒患有严重的疝气病仍不能幸免,年迈的他数次被分配到农场劳动。1971年1月,徐中舒因连续受到刺激而突发心因性精神病。6月,夫人江聪经检查确诊为食道癌晚期,徐中舒的心情变得极度压抑,失眠现象极为严重,不得不靠服食各种安眠药来入睡,最后因身体太差无法坚持到学校学习。1972年4月,江聪的病逝再次给徐中舒以沉重的打击。

徐中舒历年发表的论文也被无理批驳,他为动员全民抗战所撰《为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战》被视为“彻头彻尾的反共口号”,《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被上纲到“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唱赞歌来反对土改”,《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是“为配合右派要党轮流坐庄的需要而写的”,《孔子的政治思想》则是“一棵大毒草”,诸如此类的例子层出不穷,尽管徐中舒饱尝辛酸,但他告诫家人“丹青自有后人书”,凡事总以宽容之心泰然处之。

“文革”结束后,徐中舒以高涨的热情翻检资料写作论文,八十高龄亲临考古现场,考察新都县马家公社的战国土坑木椁墓、五代前蜀永陵和后蜀和陵等,且身体力行招收先秦史、古文字学、考古学专业的硕博研究生。在其主持下,《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甲骨文字典》、《汉语大字典》等大部头工具书相继编纂出版。

1917年2月,徐中舒任安庆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这是他从事教学工作的开始,此后其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教书育人。徐中舒进入川大的当年即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年年不间断,1946年指导论文多达九篇。1947年,徐中舒休假一年,兼任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本年仍通过信函指导评阅川大史地学系第十六届学生的毕业论文五篇。徐中舒指导过中国文学系、史学系、史地系本科生和先秦史、古文字学、

宋史、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对学生们的论文均撰有中肯的评语。^①

徐中舒在川大开设了“殷周史料”、“中国近代史”、“明清史”、“中国古文字学”、“铭刻学”、“先秦史”、“先秦史科学”等课程。1938年，他为历史系四年级（第七届）学生开设“殷周史料”课。据学生吴天墀回忆，课上并无讲义，徐中舒手持手写讲稿，学生笔录。教学结束后，吴的课堂笔记作为检查听课效果的样本收去，发还时所有笔误及遗漏之处皆被徐中舒用朱笔修改。吴天墀将笔记本一直珍藏在身边，后来送给徐师作为纪念。徐中舒在原有大纲、讲义的基础上不断修订和补充新知识。1957年，经徐中舒讲授，由罗世烈、谢忠樑、常正光、缪文远等记录并编写成十三个专题约十余万字的“先秦史教学大纲”。1963年，又根据他为川大历史系五年级同学讲授专题课时的记录，由谢忠樑、罗世烈整理而成“先秦史讲义”，共十讲，约十一万字。1965年8月，徐中舒再次为历史系五年级编写《先秦史专题课讲义》约四万字，因“文革”动乱未能完成。每次上课徐中舒必精心准备，学生们因此大有收获。据徐中舒的学生郦家驹、洪廷彦回忆：“到了三年级上学期，抗日战争刚胜利，开学不到两个月，丁山先生急于回安徽处理家务，他讲授的中国古文字学由徐先生接着讲下去。两个月的课，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使徐先生欲罢不能。寒假后，他应全班同学的请求，增开了‘殷周史’。无论开什么课，徐先生备课都非常认真。他总是先拟好提纲，列出要点，编成讲义，内容充实而线索清晰，其间包含他自己许多专题研究的独创见解和前人以及当代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我们不仅在课堂上获得宝贵的知识，还可以从中领略研究问题的途径。”^②

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徐中舒出于对学生负责，教学上不愿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从58年到60年很少上课。直至1961年学校同意徐中

① 参黄晏好：《徐中舒先生指导史学毕业论文（1938—1949）评语辑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77—80页。

② 参徐亮工：《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未定稿），《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334页。

舒按自己的学术观点授课,他才开展教学工作。“文革”中徐中舒历经磨难,仍念念不忘教育兴国之职,他说:“我是一个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者,我认为文化教育是国家民族存在的标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暂被人欺负,甚至灭亡,连文化教育也随之灭亡,那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将永沉海底,永世不能翻身;我从事文化教育,把工作做好,守先待后,这也是救国之道,也就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①“四人帮”粉碎后,川大历史系领导来徐家,请求培养研究生,徐中舒欣然应允。1978年,徐中舒亲自主持研究生复试。同时徐中舒受高教部委托,在川大举办“先秦史进修班”,面对全国高校招收中青年教师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教学,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步行前往,风雨无阻。来自11个院校的11位进修教师,回到单位后都成了学术骨干。同年7月,他因胆囊炎急性发作并导致败血病入院治疗,他多次带信让里里的同志到病房商谈研究生及进修班的工作安排。1981年7月,川大历史系在其带领下获得“中国古代史”和“西南考古学”两个博士授予点。徐中舒希望通过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文科人才。他多次恳切教谕学生要热爱祖国和自己的专业,树立虚心学习的治学之风和老实诚恳的为人态度,做一个正直的学人。^②

徐中舒的一生可以概括为读书、教书与著书,其珍视书籍之心远甚他人。“文革”伊始,徐家被勒令搬迁到校外约20平米的门房居住,大量藏书无法安置,徐中舒深知书籍是先祖和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这些日积月累的书籍对研究古文字学和古代史十分适用,有些书籍不是随时可以买到,积累不易,散失更觉可惜,因此不舍轻易丢弃一本。徐中舒数次表示愿将书籍捐献给学校,直到1968年4月历史系才接收代管书籍,存于文史楼三楼历史博物馆库房,共运了5板车,历时20余天。

1991年1月9日,徐中舒因劳成疾,在成都与世长辞,享年94岁。亲属尊其遗愿,将其几十年辛苦积累的各类图书全部无偿捐赠给四川联

① 参1969年徐中舒:“我的改造计划”。

② 徐中舒:《历史系徐中舒教授对今年报考研究生的希望和要求》,《四川大学校刊》第117期,1982年10月28日。